

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 宋庆森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这是新时代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行动指南，需要认真领会、努力践行。

基层党组织要做党的主张的宣传者。通过组织培训、“三会一课”、自我学习等方式积极学习党的主张，真正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出台的背景、目的和意义，从整体上系统把握党的主张合理性、科学性和有效性。要坚持把政治性原则放在首位，既不能夸大宣传，更不能负面宣传，要不折不扣地把党的主张的真实意图向群众说清楚、讲明白。在基层群众对党的主张存疑的时候，能当面回答的要及时进行回应；对于一时讲不清楚的，要及时向上级党组织请示汇报，把问题弄清楚后再向群众进行解释和说明。要根据基层工作的特点，选择具体的宣传方式，坚持群众喜欢什么方式、熟悉什么方式、比较容易接受什么方式，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宣传方式。对于基层知识分子群体可以采取研讨式，对于普通农民群众就可采取谈话式、讲授式、网络式等，对于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群众就要更多地采取小型、业余时间进行的方式。

基层党组织要做党的决定的贯彻者。在实践中，要求群众做到的，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首先要做到。当群众对党的决心存疑虑时，基层党组织要在宣传群众的同时，积极引导党员和领导干部先行先试，用党员行动的效果证明党的决策的正确性、合理性，不断打消群众的疑虑，进而引导党的决定在基层得到顺利实施。基层党组织要把党的决定同基层的现实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根据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优势和特点，做好执行党的决定的工作分工，并建立相应的领导机制、协调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责任机制，保证党的决定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围绕自身政治功能的实现，创新基层教育培训的方式，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能力、服务协调能力、狠抓落实能力、化解风险能力，保证组织内部坚强有力。

基层党组织要做基层治理的领导者。根据基层自治的相关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环境，领导好基层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基层社会组织等的自治，保证基层各类自治组织依法开展工作。把基层的普法工作作为基层党组织一项重要的任务，提高基层党员和群众学法、守法意识，依法开展基层治理工作，自觉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实现基层群众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加强基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基层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贯彻基层基层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把基层道德建设作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广泛开展和谐校园、和谐乡村、和谐社区、和谐企业建设。

基层党组织要做团结群众的动员者。重视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了解不同领域基层基层组织工作的普遍性和差异性，把握基层动员的基本规律；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困，把握群众工作的基本要求；认真研究新时代基层工作的新变化、新发展、新要求，不断创新新时代群众动员工作的思路、措施和办法。通过政治功能的发挥，让基层群众了解基层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党支部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职责的发挥，让群众感受基层干部的服务意识和公仆意识；通过广大基层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让群众感受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通过深入走近群众、走进群众，不断增强自身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公信力，真正让基层群众感到党员干部是基层改革发展的引领者、基层党组织是基层创新发展的谋划者、普通党员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者。

基层党组织要做改革发展的推动者。引领基层践行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个人发展与集体壮大、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等紧密结合起来，用新的发展理念不断激发基层的生机与活力。立足实际，不断优化自身发展的方式与手段，逐步实现由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产业发展的转变、单一的发展模式向多元化融合方式转变、个体经营模式向互助合作共赢模式转变，真正发挥科技、合作在基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基层教育、养老、医疗、就业等水平的不断提升，让基层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推动集体资产的科学利用与合理分配，让基层群众分享集体发展的成果；推动基层各类合作组织特别是农村合作社依法、照章运行，让基层群众共享合作发展的成果。

从红四军争论到古田会议

核心阅读

建军初期，朱德、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四军党内发生了一场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为了解决争论，朱德、陈毅都作了极大的努力，最终在毛泽东主持下，以古田会议召开为标志，这场党内争论得到了妥善解决，成为党史军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 李步前

1929年12月底，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解决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重大课题。就是这样一次部队军级单位的党代会，像灯塔一样照耀着新生人民军队的前进方向，在党史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红四军来了一位留洋生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辗转来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耒市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四军军委（即党部）。不久，根据中共中央规定，改称红军第四军，之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统辖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代表党中央领导红四军和地方党组织工作。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主要在军队，于是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

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但是其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日趋严重。这是因为，红军成员主要来自农民，既包括直接参加红军的农民，也包括从旧军队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农民成分的官兵。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的1329名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0%以上，不可避免地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来，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倾向、不重

视根据地的流寇主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随着一个叫刘安恭的人的到来而集中爆发出来。

刘安恭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又被送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8年5月初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这时，前委的地方工作任务加重，于是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到职后，随即召开军委会议，规定前委不能管军队，只能管地方工作，并且以完善领导体系为名要求把“临时”两字去掉，在红四军正式恢复军委。这样一来，围绕“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红四军党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其本质是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这是一个事关红军性质和发展方向、甚至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

对于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和问题，毛泽东等前委领导都有所察觉，并多次召开会议力图加以解决。

先是于1928年5月底在永定县的湖雷召开前委扩大大会。毛泽东等人认为：现在红四军只有四千多人，又处在游击战争环境，和在湘赣边界割据时的情况大不相同，几乎每天都要行军打仗，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所以不应再设军委，统由前委直接领导就可以了。而主张建立军委的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刘安恭甚至指责毛泽东是“书记专政”，前委“权力太集中”，以废除“家长制”为由坚持设立军委。朱德也赞成设立军委的意见。会议开了半天没有结果，因部队要行动，只得中断。过了几天，部队打下白砂，接着召开前委扩大大会，继续讨论不设军委的问题。毛泽东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虽然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并且随着这些问题扩散的范围加大，情况日趋严重。

6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大会由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议没有设主席台，各方代表都坐在一条长凳上，踊跃发言，讨论十分热烈。会上，刘安恭趁机向毛泽东开火，并煽动其他人向毛泽东提出批评。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以一票之差落选，书记由陈毅当选。会议认为朱德、毛泽东对争论应负有责任，于是“各打五十大板”，分别给予书面警告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9月下旬，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八次代

表大会，由于没有领导核心，只能无组织地自由争论，结果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这时，大家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便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回来，但由于毛泽东当时确实病得很重，便让他继续养病。

陈毅带回中央九月来信

陈毅性格豪爽、光明磊落，被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后大感意外，认为同志间开展批评是正常现象，完全没有想过自己要取而代之；同时感到自己挑不起这副担子，赶忙给中央打报告，“望中央速派人来”。根据中央来信希望“派一得力同志”去中央汇报工作，前委决定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出席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

陈毅到上海后，先是用一星期的时间写出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五篇书面材料，随后于8月2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汇报。陈毅详细回顾了红四军的建立和发展过程，陈述了红四军党内矛盾的演变，并一再表明他当不了红四军的前委书记，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强”。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起草中央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

周恩来作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一直密切关注朱毛红军的行动和发展。通过陈毅的汇报和介绍，他对朱毛红军的状况特别是当前的争论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他高度评价红四军创造的做法和经验，对毛泽东敢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不同意见的做法表示赞赏。他指出，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李立三也参与了部分讨论，指出红四军存在的流寇思想和极端民主化倾向。在此基础上，陈毅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后由陈毅带回，史称九月来信。信中对红四军工作任务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日夜兼程回到红四军，于10月22日在前委会上作传达，随即请毛泽东回来复职。11月，毛泽东收到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写给他的信。朱德、陈毅派部队来迎接毛泽东，这时毛泽东的病也基本好了，于是坐担架回来了。陈毅、朱德都作了自我检讨，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红四军三位主要领导人相互

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一次“永放光芒”的会议

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给中央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紧进行教育”……在红四军召开第九次会的代表大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泽东同朱德、陈毅在军内外开展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同时领导红四军进行了10天左右的政治和军事整训。通过与基层代表的广泛讨论交流，毛泽东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以及活生生的例子，如某大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士兵充满了怨恨空气，等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亲自起草了长达3万字的8个决议案。

1929年12月28日、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前委。

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涵盖诸多方面，归结起来，主要回答了两大问题：一是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把以农民为党员主要成分的党建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二是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

在党的建设方面，指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肃清党内存在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决议指出必须加强组织建设，重申“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为保证党员的质量，决议提出了以后发展党员的条件，包括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没有发洋财的观念等。

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时光荏苒，85年后，经习近平主席亲自提议，201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寻根溯源，赓续血脉，研究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被称为“新古田会议”。古田，再一次成为开启强军新征程的历史起点。

史海拾贝

陈云：如何防止纪委“灯下黑”

□ 罗 星

如何监督执纪者，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打铁必须自身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要求纪委要做到自我监督，在中纪委二次会议上提出了“谁来监督纪委”的问题，三次全会上提出要解决好“灯下黑”的问题，五次全会上要求各级纪检机关做好“清理门户”的工作，六次全会上提出“监督别人首先要监督自己”的重要命题。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向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建设一支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队伍。改革开放初期，陈云作为中央纪委的第一书记，对反腐败工作有着很多重要的论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自身建设，防止“灯下黑”。重温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不能做“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

改革开放初期，在强调经济搞活的同时，社会上曾经出现过“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要多栽花少栽刺”的观点，有人把抓党风廉政建设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认为在经济搞活的同时党的纪律也要

适当灵活。有人甚至认为纪律检查工作会成为改革的“顶门杠”，含沙射影地攻击纪检部门的工作。有的纪检干部在查办案件的过程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阻力，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畏难情绪，自嘲纪检干部是政治上的“红人”，工作中的“仇人”，经济上的“穷人”，认为纪检工作“不好干、干不好，不干好”，纪律检查工作一度出现了受阻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陈云提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要敢于管党治党。一个地区如果党风廉建设出了问题，要追究这个地区党委和纪委的责任。针对一部分纪检干部中存在的畏难情绪，陈云提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虽然有困难，但经过统一认识，是可以解决的。

必须有一股正气，不应该当“老好人”

对于纪检干部的选拔，陈云提出了标准，那就是要选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谦虚谨慎，敢于同违法乱纪的组织和个人作不调和斗争的人进入纪检部门工作，凡是怕字当头、回避矛盾、屈从压力、阿谀奉承，不能坚持原则的人，则不能做党的纪律检查工作。1979年中央纪委下发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

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对纪律检查工作人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坚持党的原则，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做遵守党规党法的模范。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要廉洁奉公，刚直不阿，严守机密，绝不容许徇私舞弊，包庇坏人。”1982年9月，陈云在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把党的纪律检查队伍本身的干部选好、用好。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必须有坚定的党性，必须有一股正气；应当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人，而不应当是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做和事佬、老好人的人。

为了更好地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陈云对领导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要在以毛泽东提倡“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离婚”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不怕撕破脸皮”，并指出“怕字当头、模棱两可、和稀泥、随风倒，是做不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陈云对党内出现的“老好人”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提出要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不是非的精神，只有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内团结才有了基础，党才会有战斗力，那种“逢人只说三分话，未

可全抛一片心”的现象是非常危险的。

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能力和业务素质

纪检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不是“金剛不坏之身”，同样面临着被腐蚀的考验。为应对外部环境的考验，增强自身的免疫力，纪检干部必须提高自身的政治水准和把握政策的能力，关键在于不断学习。为了加强纪检干部的政治能力和业务素质，陈云还提倡把纪检干部的学习培训纳入宣传和教育的整体规划之中。1986年1月，中央书记处同意了中央纪委的报告，要求各级党校把培训纪检干部列入到计划之中。中央纪委为此专门制定了《关于纪检干部培训工作的规划》，规定了对纪检干部在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文化素质三个方面进行培训的基本要求，同时对培训工作的经费保障等都做了专门的规定。之后，为了提高纪检干部的素质，在北戴河、大兴和杭州筹建三个纪检干部培训中心，并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等院校进行联合办学，有力推动了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专业化程度的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轮岗、交流和培训逐渐成为常态化的制度被确立下来。

以史为鉴